

WO DE HEI YE BI BAI TIAN DUO

花城出版社

周瑄璞 著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丽人行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周瑄璞 著

花城出版社

I247.5
426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周瑄璞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2.8

(丽人行)

ISBN 7-5360-3863-1

I. 我 ...

II. 周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895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封面设计:王 越 技术编辑: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狮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75 1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63-1/I·3157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周瑄璞：生于 1970 年
1990 年开始发表作品
曾出版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
西安市某企业报编辑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第 一 章

你从大观粗暴无知的手
中解救出我，但我却不能让
你永远握住我的手。

—

苏新我每当一个人走在这条繁
华的路上，都禁不住偷偷留意街边
窄小的过道，她知道这过道伸进
去，便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大杂院。
过道的窄和杂院的大形成鲜明的对
比，生活在杂院里的几百口上千口
人便每天从这窄道里进进出出，
如果迎面过两个人，必须得有一个
侧侧身才能行。大杂院里曲里拐
弯，从这个窄道进去，转好半天，

也许会从另一个窄道出去，再一看已不是这条街了。窄道口大多写着公厕两个大字，使这个窄道对于都市的意义全在于路人方便而不在于居住着那么多人。人走进去，第一个转弯处挂一个牌子，写着公厕，画个箭头，顺着箭头走到下一个转弯处，又是一个牌子写着公厕，画个箭头。走四五个箭头找到公厕，出来时也要犯一些难。

从杂院出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灰头土脸一身臭汗的妇女、老汉；也有时尚得不得了，身上香喷喷的女孩子，初中没毕业，任何技术没有，神出鬼没，不知从事什么，家人跟着吃香喝辣，爸爸戴大块金戒指，妈妈拿翻盖手机，哥哥抱着几千元的哈巴狗。

夜晚的灯亮起时，大杂院外围的大小街道必定是灯火迷离，不了解底细的外地大款或想偷鸡摸狗的旅游者会以为到了洞天福地，可以掏了钱便尽情享受。只是第二天天亮再路过这里，看到破破烂烂、污水横流的街道，对照某个店认准昨夜确实在这里消费的，便狠狠地吐口痰离去。

院子里自然是坑坑洼洼，常有小孩子好好走着摔一跤被大人再给屁股上踢一脚，一把拽起，责骂几声。

说不定哪面墙上用大大的字体写道：此处倒垃圾，狗娘养的。还会有浪漫而耐心的青年在某堵墙上留下真情表白：假如我有了钱，第一先孝敬我妈，第二……

临街的房子要是租给饭馆那更惨了，日夜不停地通

通叫着向院子里排油烟。如果站在高处，会看到平房或二三层楼（这类院子顶多三层楼，自己盖的那种）的顶上触目惊心的垃圾，直令人奇怪，它们是怎么上去的。还有居民家永远用不着又绝对舍不得扔的家什，踩着梯子小心翼翼地转移到上面的，蒙着塑料布，甚至不辞劳苦地搭个小棚，像尘封多年不能触及的心事般掖在那儿。

有许多人家养花，在房檐上、窗根下，旮旯拐角，能挤的地方都挤上一两盆，沾了什么光似的，指甲草，太阳花，喇叭花，一串红，地雷花，都是些不值钱的贱东西，稍富贵的芦荟，君子兰什么的，水土不服似地干不干黄不黄。这样也好，长得太好会被偷走。

院子里的人靠出租门面、开出租车、拐的（残疾人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正常人也许可驾驶营运）或做各种小得不能再小的买卖为生，有滋润得每个月收入上万的，也有一家人守半间门面一个月靠死一千元的。当然，这都是正当收入正当劳动，至于卖大烟，偷的摸的抢的骗的编的坐台的那另当别论了。

累的人累得半死，推个小车车冬天卖蒸红薯，夏天卖切成一块块的哈密瓜、菠萝、西瓜，春天卖这糕那蜜的，秋天卖煮花生。总之一年到头总有得卖，吹得满头满脸都是灰尘也顾不得。逮空数数手里的钱，刚想偷着乐一下，一抬眼见远处戴大盖帽穿制服的来了，推着小车车就跑，往往生意还未成交，或是顾客拿了东西还没

给钱，不要了；或是收了钱还没给人东西，身后一串骂，顾不得了，跑掉算了吧。清闲的人也清闲得不行，祖上留下的一溜门面房，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生意起步早，这会儿钱攒得不耐烦，给儿子买辆车，开着玩去吧，给女儿买套房，找个好婆家，剩下老爹老娘留恋这大杂院，死也要死在这。反正钱是足够花，孙子的也有了，还求什么呢，啥流行咱弄啥，管它咱是啥身材，桶也好，糖葫芦也罢，穿上紧身衣，谁怕谁呀。管它年龄六七十，烫一头卷，对世事对年轻人一百个不服气似的，不流行了？拉直重来呀。

反正这大杂院里的人总是最时髦的，街上流行什么，大杂院的小年轻老年轻争着穿什么，有钱的穿几百几千的正牌货，没钱的穿几十块的冒牌货。像一个人屁股上的胎记一样，虽然别人看不到，但终归是长身上的，自己老也记得。永远都抹不掉。

这大杂院的生活，新的，旧的，昨天的，现实的，深深地印在苏新我的心里。

苏新我在大杂院长到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她有了稳定的住处，有了让她提起大杂院便心虚便恼火的朋友圈子和社交范围，所以她从心理上与这里一刀两断了。

大杂院里的苏新我不叫苏新我，叫苏文革。她是年头生，年尾生了一个妹妹，叫苏文化。当然她俩都不是生于1966年，而是早几年，那时她们的名字不叫苏文革、苏文化，是1966年改的。苏文化现在也不叫苏文

化，叫苏亚咪或苏安莉或苏美琪。这会儿人大概在广东或上海或海口。

苏新我有时与同事、朋友逛大街，看见类似的大杂院，在繁华大街旁伸个窄窄的口，像个阴谋似的躲在两间高档门面的中间。她故意不看它们，但她知道那窄窄的口认识她，全心全意还想找机会跟她搭讪：Hello！文革，你咋老也不见回来呀。是啊，你爸死了，你妈也死了，你就可以不回来了吗？可这里还有你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还有侄子侄女，还有你最牵挂的宝山呢，你不回来看看他们吗？你真的不想他们吗？

我想，我想。苏新我心里说，尤其是想小五、七斤，我哥算什么鸡巴玩意，一个没有一次不骂我，抽大烟抽得要死，另一个没有一次不诉苦，好像全世界就他命苦。我嫂子也不是东西，净想我口袋里的钱，给她再多总认为应该更多。只有小五，七斤，我的侄子侄女，我的心肝宝贝，我常想念他们，可我实在不想见他们的爹娘。我也不愿进到那大杂院里。

有一次，苏新我陪她的大学同学，在民政局当干部的刘艳丽到类似的大杂院里看一个老太太，这城市里这样的大杂院真多呀，大街旁的，胡同里的，哪儿哪儿都有。谁说这城市地盘小，人口拥挤，把这成片成片的、牛皮癣般的大杂院全折了，盖成高层住宅，你看人口还挤不挤了，能多出多少地方啊。那老太太住的院子不大，门口左边是个水管，拿大锁锁着，专人看管，该开

时再开。右边是一个公厕，也是管水管的人管着，除了院子里的居民，外面人都入厕两角。这是那老太太说的，刘艳丽在与老太太谈话，苏新我迟疑半天问老太太：“大妈，您这儿有卫生间吗？噢，不，厕所。”老太太指指大门口说：“在外边呢，你进来时没看见？走，我带你去。”“噢。不用不用，我自己去。”苏新我从包里拿出手纸起身，老太太比她起身得还麻利。“我带你去，要不，他得收你两毛钱呢。”

老太太是因为儿子不给付生活费而把儿子告到民政局的，她好像也知道不该告到民政局而该告到法院，但她往法院走的路上看到了民政局，便进去告了。民政局自然要往法院推，老太太往沙发上一坐说：“你今儿不处理我就不走了。”中午饭都是在民政局吃的。刘艳丽给她打的饭，处长看没法便派刘艳丽将老太太送回家，答应帮助调解。这天正好苏新我找刘艳丽办个闲事，两人便一同到老太太这儿。

老太太的屋里就一张床，一个破柜子，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一个炉子两个锅。她说儿子一年了也没给过她钱，她全靠夏天到街上拾些饮料瓶子卖点钱，可现在到了秋天，饮料瓶子少了。马上过冬了，她拿啥生活呀。

她的儿子住在旁边的一间大房子里，门窗都关着。刘艳丽向邻居调查情况。邻居咬着耳朵给两人说，老太太儿子不是亲的，拣来的。三十年前老太太拣破烂时拣

的。老太太解放前是妓女，解放后从良嫁了个男人，有工作的，命不好，几年就死了。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心眼很善的，光想积德，拣了个月子娃娃，回来一把屎一把尿养大，想养老呢，这会儿连一分钱也不给。儿子这会儿在报社工作，是个记者，早先是个体户，赔了后到南方学手艺，学了手艺回来不知咋的又弄不成，这事那事干啥啥不行。这会儿不是记者满天飞嘛！识字的都能干，人家不知咋整的，当上记者了，报纸上天天有名。嗨，上个月还写文章批评郊区一个厂的工人不孝敬父母嘛。去年娶了个媳妇，农村打工来的，也是记者，可能是从那以后，就不给老太太钱了。这几天不见人，两口子都不见。

苏新我听着听着，环顾着破败的院子，莫名地生出一股恐惧，好像一不留神命运又会将她投进这里一样。她回头看看刘艳丽真实地存在着，皮肤发着保养良好的亮光，低头看看自己做工精良的皮鞋，抬头看看天上灰蒙蒙的太阳，她甚至想从包里掏出工作证，再看清她是大学教师苏新我而不是大杂院里的苏文革。不，不，我不属于这里，我压根就是投错了胎，我本该投到大学教师或当官的家里的。可我在这逗留什么呢？万一时间定格，我就定在了这里，万一地震战争爆炸发生，我会死在这里。

她拉拉刘艳丽，使个眼色，做了个走的手势，刘艳丽会意，两人走回老太太的屋子，不约而同地从自己包

里拿出一百元钱给老太太，刘艳丽又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人似地说了些官话。告辞老太太，两人的皮鞋敲着水泥地面，登登登地离开了这里。

来到繁华的大街上，她仰起头，像活动颈椎又像是甩头发地将头晃了晃，她跟刘艳丽建议美美逛一逛商店，刘艳丽同意了。

二

苏文革早晨起得很晚。这是寒假，再不用早早爬起来去上学。冬天的早晨人睡得最香最甜，迷迷糊糊中，她感到妹妹苏文化已经起床，她似乎听到她洗脸、梳头、打开炉门热剩饭的动静，然而那动静始终不能彻底让她醒来。她翻了几次身，重新蒙了几次头，接着又香甜地睡。然而她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感觉使她惊醒，她脑子木木地醒了，慢慢找着那感觉，终于发现那感觉来自下身。那里潮乎乎的。她想起这感觉好似昨晚睡前都有了，睡觉前她曾坐在床上的被窝里看《聊斋志异》，那奇妙诡秘的人鬼恋，那陌生暧昧的细节，使年幼的苏文革脸红心跳，她似懂非懂地激动着。那时母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父亲蹲在床沿下喝酒吃五香花生米，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母亲这不对，那不好。骂母亲是他最重要的下酒菜。两个哥哥在糊火柴盒，眼睛闪闪烁烁地偷瞟一下父亲，不敢发出声响。苏文化在苏文革

身旁另一个被窝里蒙着头，一动不动，不知她睡着没。屋里灯太亮，她只能蒙头。她们从小便在亮着灯的夜晚睡觉，因为母亲干活总是干到很晚，父亲喝酒骂人也到很晚，甚至比母亲干活结束还晚。他睡时经常忘了关灯或者懒得关灯。苏文革被聊斋勾引着激动着魂魄，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被窝里看。她感到自己脸发烫，耳根发热。他们之所以聚到一个屋子里来是因为这屋里有一台破收音机。收音机每晚都会在这个时候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的歌。也许没有人听，但每晚得开着，像二十年后家家七点打开电视一样，习惯了。其实炉子在外间，就放在父母的床边。但家里人除了苏文革外都不怕冷，尤其是两个哥哥，从来不知冷似的。

苏文革掀起被子，看到床单上有片片血迹。自己的大腿内裤上也都是血。“文化文化快来。”苏文革叫起来，她的妹妹苏文化端着饭碗从外间进来，看到床单上的血，也吃了一惊，然后镇定地告诉苏文革：“姐，你来月经了。”

“月经？是怎么回事？你咋知道的？你有吗？”苏文革急得流了泪，求救地看着妹妹。

“我还没，我从书上知道的。女孩十二三岁会来，你刚好，十三岁。”

“可我把床单弄脏了，咱妈会骂死我的。”

“洗呗。你快起来，咱现在就洗，洗了搭到炉子上烤着，赶中午咱妈回来兴许能干呢。”

苏文化永远都比苏文革有魄力。她三两下将碗里的稀饭扒到嘴里，就来卷了床单往水盆里按。姐妹俩手忙脚乱洗好床单，站在门外一人握着一头使劲地拧，将床单拧得麻花似的。进屋抖开踩着小凳子搭到炉子上方的铁丝上。苏文化弯腰拨开炉门。“这样，咱妈回来前就能干了。”

吃了饭，两人趴在床上写寒假作业。

宝山推门进来，一下子把脸蒙在湿床单上。

“哟，吓我一跳。”宝山说。

“宝山，你又乱跑，今天的作业做完了？”苏文化问宝山。

“我前天一连气做了三天的。”宝山说着，坐到了床上。坐了一会找不到话说，只觉得苏文革的脸上带着与往日不同的神气，让人捉摸不透。“哎，你俩听说没，咱院子西头的二毛打架把人打死了。”昨天晚上公安局的把他逮了。苏文革没吱声，只是盯着作业看着写着。

“咱院子那个扫厕所的老余，就那反革命，昨天早上有人听见他唱外国歌呢，好像是苏联的歌，大观他妹子听见了，嘟噜嘟噜的，怪好听的。见有人进来，马上不唱了。”

苏文革还是不吱声，仍低头写作业。宝山看看姐妹俩，觉得挺没趣，他便脸红了。抬头看看床单，见冒着湿湿的烟气，看看桌上的小闹钟，走到了九点半。宝山有些不自在地低下头，用手摸着胸前别在棉袄上的毛主

席像。忽然，街上传来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宝山站起来说：“哎，又有毛主席的红宝书出版了，你俩去看不。”

姐妹俩站起来，跟上宝山往外走。苏文革走到门口，又回转身，到里屋的枕头下面叠了好长一张卫生纸装到口袋里，这时苏文化已踮着脚尖把炉子上方挂的单子拉动了一下位置，弯腰将炉门扣上了一半，把铁锁拿到手里。

1976年的春节就要来了，母亲给服装厂锁扣眼的活赶得更紧，他们兄妹糊火柴盒的工程也赶得越发急了。每晚，除了父亲外，五个人都在忙碌着，照例开着收音机。大家都屏息静气不吱声，然而丝毫不影响他们互相配合，四双手飞快地在小桌子上闪动，折纸，刷浆糊，摆纸片，封盒，各干各的，有条不紊。好像这糊火柴盒的工序是专为这兄妹四人设计的。暂时等活的人也不吭声，偷眼看看父亲，或者飞快地看一眼表。被等的人不用催便更加快速地供活。收音机里唱起一支铿锵有力的合唱，这正好人不瞌睡了。然而那歌很快便结束了。苏文化撑不住，便张嘴打起了哈欠。父亲看见了，说：“碎女，睡去吧。”

苏文化马上起身舀水，再从炉子上的小壶里倒了点热水，在脸盆里洗手。母亲抬头看看表，见十点半了，便看看父亲，对几个孩子说，瞌睡了都睡吧，明天早点起来再糊。几个孩子看看父亲，见他没反对，便盖了糍糊瓶盖，把抹了糍糊的纸条和纸板封好，纷纷起身睡觉

了。

锁扣眼和糊火柴盒的活终于完工了，再有四五天就要过年了，一大早，父亲叫上两个哥哥去菜市场排队买菜，母亲去给服装厂送衣服，苏文化不知是也跟去了，还是自己出去玩了。总之，家里只剩苏文革一人，她趴在床上看那本早已被多少人翻破了的《聊斋志异》，桌上的座钟当当地敲了一下，是十点半了。屋子里炉火封着，母亲走的时候，用小铁铲铲了几块焦炭放上，房间里焐得很暖和。那时别人家都烧蜂窝煤而她家烧焦炭，不知是别人给的还是父亲或哥哥从大食堂的锅炉房拣来的。多年后苏新我已记不得那焦炭的来历了，总之是因为比烧蜂窝煤划算才烧了焦炭的。那之前的一年和之后的几年是否烧焦炭，苏新我真的不记得了，谁会记得二十多年前的琐事呢。苏新我之所以记得她家那一年烧的是焦炭而不是蜂窝煤是因为那焦炭突然爆出一粒小块飞到她脖子上，她正在疼痛时，大观进来想占她的便宜。

初潮，焦炭烧脖子，大观的性骚扰。她始终记得这三件事是发生在一起的。是的，正是她十三岁的那年冬天。

对，房间里焐得很暖和，多年后苏新我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时，时常怀念起那年冬天烧焦炭而焐得热乎乎的房间，她厌恶那大杂院里的一切但总是怀念那温暖的房间，如果不是三分钟后大观溜进来，那将是她童年与少年时代交接时完美的记忆。

她正低头看书，耳边砰的一声响，她还没来得及追寻那响声来自何处，也就是同时吧，她的左边脖子，猛地灼热疼痛，她用手摸时，手上带下了脖子上的一块皮肉。她明白是焦炭炸开崩到她脖子上了。她咧了咧嘴想哭又马上忍住了，家里就自己一个人，那疼痛也不是到了非哭不可的程度，还是算了吧。她正摸着脖子寻思，棉门帘一挑，大观进来了。大观那表情与平常没什么二样，或者有了二样而苏文革没有顾上看。只是见了大观进来忙倾诉：“唉呀我倒楣死了，焦炭崩出来把我烧了，皮都烧掉了。”说着她用手扒着棉袄领子给大观看。大观凑上来看她的脖子，也许在凑近看的过程中他的表情有了些小变化，然而以苏文革当时一个刚月经初潮的小丫头是不会知道一个十五六岁缺少家教的男孩子的内心躁动的。“疼吗？让我摸摸。”大观说着，手不往她脖子上摸，却一把抱住苏文革，手凑向了她的胸前，嘴里胡乱地说着还疼不疼，让我看看，你别吭声，求你别喊。好像他比苏文革还要慌忙。苏文革倒是镇定，那一刻她吃惊地发现她原来如此镇定，她并没有喊。她虽然还来不及知道大观怎么了。但她总知道她大声喊没什么好处，并且她不想把这件事定性为耍流氓。她只是拧着腰身说：“讨厌讨厌快松开，我不跟你玩了，我要踩你脚了。”她感到大观的手仍在她胸前争分夺秒又无望地隔着棉袄摸抓着，便用脚跟狠踩了大观的脚尖一下，大观疼得叫一声，便认为可以理解为交换，手便更有蛮劲